

宋明理学之经典诠释思想刍议^{*}

——兼论与西方诠释学的异同

蔡方鹿

【提要】中国有两千多年注释儒家经典的传统，有丰富的关于诠释学的思想资料，并形成了较有代表性的若干诠释方法和理论。然而有严密逻辑和完整体系的诠释学尚不多见。从借鉴西方哲学诠释学的思维成果出发，在探讨理学家丰富的经学思想的基础上，以各派理学家对儒家经典所作大量诠释及其诠释方法论为依据，从中概括提炼出宋明理学的经典诠释思想，并将其与西方诠释学作一比较，以便为构建当代具有中国特色的诠释学提供一定的借鉴。

【关键词】宋明理学 经典诠释思想 西方诠释学

〔中图分类号〕B244、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952 (2011) 01—0031—08

宋明理学经典诠释思想有自己产生发展的时代背景和内在逻辑，通过各派理学家对儒家经典所作的诠释表现出来。诠释学虽然是从西方引进的一种理论学说，在西方有较长的演变发展历史，并在当代发展成为较有影响的哲学思潮之一，但在中国却是一门正在建立过程中的学问。把西方诠释学与中国经学史上长期形成的经典诠释思想结合起来，对宋明理学的经典诠释思想展开系统的研究探讨。通过比较研究，可以发现，双方存在着相同相异之处。其相同处体现了中西方诠释思想的共性，其相异处又是中西方各自特点的反映。

一、宋明理学的经典诠释思想

中国经学发展到宋代，发生了历史性的变革，不仅产生了宋代义理之学，更重要的是在义理之学基础上产生了具有思辨哲学色彩的理

学，理学家既吸取佛、道精致的思辨哲学又批评佛、道不讲儒家伦理的宗教教旨教义。理学是对传统训诂注疏之学、笺注经学流弊及佛教冲击儒学的深刻反思和回应。理学的兴起，促进了中国经学及整个中国思想文化的持续发展。宋明理学作为具有思辨哲学色彩和时代特色的新儒学，是中国经学发展到宋元明时期产生的代表当时中国文化发展趋势和时代精神的学术文化思潮，应把理学研究放在中国经学发展的大背景下，遵循经学演变发展的理路和内在逻辑来研究和探讨理学家们是如何通过诠释儒家经典来提出和阐发他们具有时代特色的理学思想的。理学不仅与汉唐儒学有不同的经学观和经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经学与宋明理学研究”（04zx001）的总结性成果之一。

典诠释思想，而且理学各派亦有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典诠释思想，应深入研究理学及其各派的典诠释思想，他们的同中之异，异中之同，以反映宋元明时期经学发展的精神实质及特点。通过以宋明理学家对儒家经典所作大量诠释为研究对象，加以哲学上的抽象，从中概括提炼出宋明理学的典诠释思想，大致具有以下一些基本内涵和特征：

（一）由诠释困境到重新诠释

宋明理学经典诠释思想产生的背景是学者即诠释者对至高无上的儒家经典的注释陷入诠释困境，汉唐学者奉行注不违经，疏不破注的解经原则，墨守正义，忽视义理，不能从经典中阐释出治天下的道理，导致理论危机和社会危机。二程提倡以己意解经，认为只要道理通，符合义理，则不必拘泥于经书文字，甚至文义解错也无害。这就为发挥义理提供了方便。二程说：“善学者，要不为文字所桎。故文义虽解错，而道理可通行者不害也。”^①即是说，在解经的过程中，不受经书文字的束缚，应大胆发挥义理，使之通行于世，在道与文字之间，以道为主。应该说，二程提倡的是一种思想解放的精神，是对汉学热衷于注经、释经，不注重创新和发挥而陷入诠释困境的流弊的针砭。由于汉唐诸儒训诂义疏的治经方法长期以来束缚着人们的思想，不利于新思想的产生，这就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国思想文化及社会的正常发展。二程在新形势下，提倡以己意解经，以义理说经，促进了学风的转变和新思想的产生，这不仅对中国经学，而且对整个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先儒旧说成为定势，陷入诠释困境的情况下，理学家亟须创新，回到原典，目的是为了从原典中找寻适合社会发展的“道”即天理，吸取道、佛的本体诠释思想，统合求知与求理、求道，摆脱诠释困境在于重新诠释。

（二）关于宋明理学经典诠释的基本问题

经典与形上之道（亦即“天理”、心或良知）的关系问题，即是理学经典诠释的基本问题。经典的语言文字、作者、诠释者都须服从道，以道为最高原则。不过在心学那里，心、心之良知即是道；气学家也以“立天理”、复圣人之道为价

值标准。二程明确提出“经所以载道”的思想，把儒家经典作为载道的工具，强调道与经典相比，道更为重要，道是儒家经典所追求的目的，而不是为经典而经典。二程把儒家经典从汉学盲目崇拜的神圣地位上拉下来，置于服从于道的位置，这对于打破“疏不破注”，“惟古注是从”的汉学旧传统，以义理之学取代汉唐笺注经学，具有重要意义，是经学史上划时代的重大变革。二程指出：“经所以载道也，器所以适用也。学经而不知道，治器而不适用，奚益哉？”^②一本云：“经者，载道之器，须明其用。”^③认为经是“载道之器”，即载道的工具。道为本，经为末；道为体，经为用。学经是为了知道，正如治器是为了适用一样。如果学经、治经不以明道、求道为目的，那是无益的，说明经典是为明道服务的。这一思想是对汉学的一大冲击，因为在汉学家看来，不仅经典是神圣至尊、不可动摇的，而且对经典的注也是不可改动的。但二程却把神圣至尊的儒家经典置于器、用的位置，服从于本体之道，这不能不说是思想解放的创新精神的表现，这就为新思想的产生开辟了道路，并为朱熹、王阳明等理学家所继承和发展。

（三）关于经典诠释的依据和标准

朱熹作为理学经典诠释的代表性人物，他以经典原文和原义为经典诠释的依据；以义理及天理为标准诠释儒家经典，融合经学诠释与哲学诠释。集中体现了理学的经典诠释思想。

1. 以经典原文和原义为经典诠释的依据

从解经应以经典原文和原义即圣贤作经之本意为依据，须用明白易懂的语言把古圣贤难读之语解释开来的观点出发，朱熹对当时学界存在的以己意附会经文原义，以及脱离经文本义的解经流弊提出了批评。他说：

且就本文理会，牵傍会合，最学者之病。^④

① 《河南程氏外书》卷6《二程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78页。

②③ 《河南程氏遗书》卷6《二程集》第95、95页。

④ 《朱子语类》卷118，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841页。

大抵某之解经，只是顺圣贤语意，看其血脉通贯处为之解释，不敢自以己意说道理也。^①

然读书且要虚心平气随他文义体当，不可先立己意，作势硬说，只成杜撰，不见圣贤本意也。^②

今学者不会看文章，多是先立私意，自主张己说；只借圣人言语做起头，便自把己意接说将去。病痛专在这上，不可不戒。^③

学者不可用己意迁就圣贤之言。^④

今之谈经者，往往有四者之病：本卑也而抗之使高，本浅也而凿之使深，本近也而推之使远，本明也而必使至于晦。此今日谈经之大患也。^⑤

朱熹强调，注解经文，须依据经典文本来理会，牵强附会，乃学者最大的毛病。所以他解经，即是按照圣贤的原意来解释，不敢以己意去阐发与经文本义不符的道理。不是说朱熹完全不以己意说经，而是说朱熹以己意解经时，不以己意违背圣贤的语意。朱熹要求学者不可先立己意，而不见圣贤本意。他批评学者在看经文之前，先立私意，以自己的观点强加于经书原文，往往只是借助圣人的言论起个头，接着就按自己意见说下去，常常不符合圣人之本意，而使圣人本意难明。就朱熹经常表述的他本人的思想而言，他是明确反对在解经以前先立个观点、先入为主地去解释经典的，他认为，如果先有一个意思，再拿这个己见去解读经文，就会穿凿附会，违背经文的原义。以往有学者在评价朱熹的解经思想时认为，朱熹要求在读经前，先出自己的观点。但朱熹本人却说：“读书，第一莫要先立个意去看他底。”^⑥既然朱熹本人提出“莫要先立个意”，反对先立己意而不见圣贤本意，以至曲解经文，就不能说朱熹主张先出自己的观点。或者说朱熹类似其他宋学学者，有某些以己意解经的倾向，但至少朱熹还是意识到先立己见，以曲解经文原义的弊端，而主张“不可先立己意”。朱熹还把脱离经文本义的说经弊病归纳为本卑使高、本浅使深、本近使远、本明使晦四个方面，并指出尽管其表现各有不同，但违背经文之原义却是其共同的毛病，而为谈经之大患。

以上可见，朱熹在解读儒家经典的过程中提出以经典的原文和原义作为诠释经典的出发点和依据的思想，反对先立己意，而不见经文本义和圣贤原意。把解读经文本义，使之明白易读作为解经的基础。虽然其解经的目的是为了明理，但这却离不开依据经典原文弄清其本义这个诠释基础，如果不明原义而妄加解说，就会违背圣贤所以作经之意旨，这为朱熹所不齿，亦是他对宋学学者以己意说经之流弊某种程度的修正。

2. 以义理为标准诠释儒家经典

在通经明本义的基础上，朱熹进而提出以义理为标准来诠释儒家经典。所谓义理，指宋代新儒家的道理，从广义上讲，重义理是宋学区别于汉学的时代特征，就朱熹而言，更注重义理中的“天理论”原则。朱熹的经典诠释思想主张通经以明理，然而他认为，义理在经典中并不是十分明白地表露出来，后人要求得义理，须于经典中推究演申，从中发明义理。他说：“大抵圣贤之言，多是略发个萌芽，更在后人推究，演而伸，触而长，然亦须得圣贤本意。不得其意，则从那处推得出来？”^⑦朱熹在这里强调两点，一是圣贤所言，于义理只是略发个萌芽，尚不明白，所以须进一步推究发明；二是发明义理须建立在圣贤本意的基础上，如果脱离圣贤本意，则难以推出义理来，即使勉强去发明义理，也与圣贤本意不符，为朱熹所不道。朱熹要求学者解经不要仅停留在“萌芽”状态，即不满足于解字释文的阶段，要在弄懂经文原义的基础上，进一步去推阐发明义理，把求经文本义与以义理解经结合起来，而不是互相脱节。他说：“解说圣贤之言，要义理相接去。”^⑧朱熹明确指出，解经要以义理与圣贤之言相接，正因为圣贤所言，于义理并没有讲得十分清楚明白，所以朱熹主张要以义理与圣贤之言相接，即以义理来解读圣经，从中发明与时代发展紧密相

① 《朱子语类》卷52，第1249页。

② 《朱熹集》卷53《答刘季章（十）》，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2640页。

③ 《朱子语类》卷117，第2811页。

④⑤⑥ 《朱子语类》卷11，第185、193、191页。

⑦ 《朱子语类》卷62，第1512页。

⑧ 《朱子语类》卷19，第437页。

关的义理思想。否则，只解字释文，停留在训诂考释的阶段，而忽视义理，或以训诂代义理，流于汉学之弊，而缺乏义理之时代精神。由此朱熹提出了以义理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来释读经书，他说：

读“六经”时，只如未有“六经”，只就自家身上讨道理，其理便易晓。^①

这读书，是要得义理通，不是要做赶课程模样。^②

凡读书，先须晓得他底言词了，然后看其说于理当否。当于理则是，背于理则非。今人多是心下先有一个意思了，却将他人说话来说自家底意思；其有不合者，则硬穿凿之使合。^③

指出在读“六经”等经典时，要以道理去解说，虽然道理存于人心，但却不是解经者个人的主观臆见，而是具有本体论的哲学依据，以新儒学道德理性为内涵的解经的标准。读经书的目的在于通义理，不是赶做经学课程。朱熹强调在读书明确经文言词之义的基础上，就要以义理作为评判是非的标准，凡符合理的便为是，凡违背理的则为非。而朱熹所说的理，是指新儒学的义理及天理，而非解经人预设的“自家的意思”。朱熹反对在解经时先有一个自家意思，然后再以这个意思去解说经文，凡与己意不合，则硬穿凿附会使之与己意合。这种先立己意，不问或脱离经典本义的穿凿附会的诠释经典的态度，为当时宋人解经之通病，朱熹对此学风持明确的批评态度，尽管他奉之以为标准的义理，与宋人解经所持的己意之内涵并无原则上的区别，但他所强调的以义理为标准诠释经文，其义理须是建立在经文本义的基础上，脱离了经文本义，即使义理讲得再好，也难以令人信服。与其打着经典的旗号穿凿附会地阐发义理，不如说是自撰经文。

（四）理学诠释思想的核心是对文本的理解问题

这涉及到一个重要诠释原则，即如何处理理解与诠释的本原性与创造性的辩证关系。这表现在处理二者关系中达成求经文本义（文本中心）的诠释指导思想与创新、阐释“天理”，建构诠释

者自身的哲学体系（以道为中心）的融合。例如张载重视读经，肯定经书文本的重要性，既重“六经”，又重“四书”，目的都是为了从中阐发义理，发明儒家圣人之道。他强调“六经则须着循环，能使昼夜不息，理会得六七年，则自无可得看。若义理则尽无穷，待自家长得一格则又见得别。”^④“六经”中义理无穷，须循环治经，才能见得义理。并强调：“《诗》、《礼》、《易》、《春秋》、《书》，六经直是少一不得。”^⑤又重视创新，他说：“义理有碍，则濯去旧见，以来新意。……当自立说以明性，不可以遗言附会解之。”^⑥主张治经应濯去旧见，以来新意，掌握经书中的义理。并强调自立己说，以明性理，不可附会先儒传注之遗言来解经，而是要用新儒学的义理来重新理解经文。

（五）宋明理学经典诠释思想的意义和基本特征

1. 时代意义

在中国，虽然没有发展出系统的诠释学理论，但却有着悠久的经典诠释传统。崇尚远古文明，尊奉古代典籍，自孔子始延续两千多年，历久不衰，儒、释、道三家都有传世的经典，都有自己膜拜的先师，亦产生了丰富的诠释实践和诠释资料。特别是儒家的经学诠释，形成了古文与今文，以及汉学与宋学两大家，前者注重训诂考据，后者注重义理阐发，都对中国的学术发展和社会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张汝伦甚至认为，“释义学^⑦作为一种人类普遍的思想方式，在中国早已存在，早已被创建。在有些重要的思想家如朱熹那里，还表现得相当系统。我们甚至可以说，从‘述而不作’的孔夫子开始，它就是中国传统思想的一种主要表现形式。”^⑧促进了经学的转型和儒学的发展，

①③ 《朱子语类》卷11，第188、185页。

② 《朱子语类》卷118，第2837页。

④⑤ 《经学理窟·义理》，《张载集》，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278、278页。

⑥ 《张子语录》中，《张载集》，第321~323页。

⑦ 关于“诠释学”的名称问题，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见解，如洪汉鼎主张用诠释学，李清良主张用阐释学，张汝伦则主张用释义学，但其理论内容是相近的，只是名称不同而已。

⑧ 张汝伦，《朱子的释义学》，洪汉鼎主编《诠释学》第一辑，山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26页。

提高了中国哲学的理论思辨水平。

中国诠释思想发展到宋代，产生了深刻的变革，由以对经典的训诂注释为主，发展到以阐发义理为主，产生了宋代义理之学，即宋学，而理学又是宋学的集中体现，是宋学的哲学化、理学化。理学以儒家经典“四书”、“六经”为诠释文本及阐释对象，通过注经阐发其哲学与理学思想不是偶然的，而有其产生的时代背景和历史必然性。

2. 宋明理学经典诠释思想的特征

宋明理学经典诠释思想的基本特征是：重文本与以读者中心并行不悖，融为一体，求圣人作经之本意与以阐释者为中心，对文本做出创新性理解和解释相结合；宋明理学经典诠释思想还具有融合本体论与知识论，将本体论与伦理学相结合等基本特征。其本体论寓于方法论之中，注经、解经是形式、载体，而思想创造才是内容和实质。

宋明理学经典诠释思想各派有不同的特点：通过探讨研究，可归纳概括出各个时期不同学术流派经典诠释思想的区别和特点：

(1) 程朱理学经典诠释思想的特点是：以“四书”为主要诠释文本，融合本体诠释与道德诠释，提出“经所以载道”的诠释思想，经是载道之文，道的价值重于经文文本，“天理”即道，故为“天理”中心论，“天理”是经典诠释的标准，直求经文之本义最终服从于以“天理”为最高标准。亦重视读书，解读经典，掌握知识，格物穷理，主客二分与主客融合并存。

(2) 陆王心学经典诠释思想的特点是：融贯主体、本体与客体，以经典为吾心注脚，相对不重视经典，但也不游离经典文本，重视通过对《孟子》、《大学》的审读，以求心、致良知，融合主体与本体，功夫与本体合一，客体消融于主体，坚持以主体为中心的诠释思想。

(3) 张载气学一派经典诠释思想的特点是：游心于经籍义理之间，反对泥于文字训诂，既重“六经”，亦重“四书”，主张循环读经穷理，把本体客体化，阐发其客体理哲学的经典诠释思想。宋明理学三大派的经典诠释思想虽有差异，但三派均以“天理”为经典诠释的最高标

准和治经学所追求的目的。诠释的结果是发现意义，阐发、发掘“天理”的价值，而不是只重方法。

以上可见，宋明理学作为中国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诠释儒家经典而建构自己的哲学、理学思想体系，其经典诠释的实质更注重对本原（本体）的体认和把握；文本诠释或诠释文本具有多样性，程朱以“四书”为主，陆王以《孟子》、《大学》为主，张载以“五经”、“四书”并重，也有回复到以“六经”为主，反对程朱以“四书”为主，提倡道寓于“六经”，而不讲“四书”。由此，既吸取和借鉴西方诠释学的思维成果，以为深入系统地研究宋明理学之经典诠释思想提供借鉴，又不简单比附，照搬照抄。通过比较可进一步探讨宋明理学经典诠释思想的特征。

二、宋明理学经典诠释思想与西方哲学诠释学之比较

宋明理学经典诠释思想研究应吸取和借鉴西方哲学诠释学和学术界相关研究成果，通过中西哲学比较，对宋明理学的经典诠释思想及其特征展开进一步的系统深入的探讨。在西方，诠释学（Hermeneutik，亦有称解释学、阐释学、释义学等）作为一门关于理解与解释的学问，经历了曲折的发展历程。早期诠释学是与对《圣经》的注释联系在一起，西方中世纪形成了以《圣经》为诠释对象的《圣经》注释学。施莱尔马赫（公元1768年～1834年）使诠释学突破了具体诠释对象的局限性，把《圣经》注释学扩展到对所有文本的解释，使诠释学从局部诠释学到一般诠释学，成为一门关于理解和解释的一般学说。狄尔泰（公元1833年～1911年）以直观与体验的方法来体验生命的真实与价值内涵，提出诠释学是精神科学的方法论基础，进一步发挥了方法论的诠释学，是当代哲学诠释学的先驱。由海德格尔（公元1889年～1976年）奠基，伽达默尔（公元1900年～2002年）发展完善的哲学诠释学，使诠释学的发展实现了从方法论向本体论的转向。把诠释学关注的中心从求知的方法转向了人的存在

方式本身，并扩展到人文社会科学的诸多领域，成为西方学术界的显学。纵观诠释学复杂的时代背景和丰富的内涵——由最初的语言诠释活动，发展到系统的文本诠释；由对《圣经》的创造理解，逐渐扩大到世俗的理解技艺；由理解技艺上升到诠释“技艺学”；由诠释的“技艺学”又发展到哲学诠释学——我们可以看出，西方的诠释学不仅是理解和诠释的技艺和方法之学，更重要的是作为一种理解和解释的本体论，亦即关于理解和解释的哲学。随着诠释学在世界的流传，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哲学界开始接触西方诠释学，在对其译介和研究日益深入的情况下，越来越多的学者以其所提供的新的方法论基础以及观察与描述人文现象的新视角，对诠释学给予了更多的重视和关注，并开始从事西方诠释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比较研究，人们提出了建构有中国特色的诠释学的构想，通过吸取和借鉴西方诠释学的思维成果，以期更好地研究中国悠久的诠释传统，并对西方的诠释学做出一定的发展，而不是把对中国诠释学的研究仅看作是西方诠释学在中国的翻版，而在于换一个角度去更好地发掘中国经典诠释的丰富内涵，促进中西方哲学的交流与中国哲学的发展。

为此，不少学者对此问题展开了研究和探讨，发表了相关的研究西方诠释学及与中国哲学相比较的论文，并出版了若干相关的研究专著。学术界虽然对诠释学及其与中国哲学的关系作了不少积极的探索和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目前以诠释学理论对宋明理学的经典诠释思想加以研究和比较研究的尚属少见，有的只是对某一理学家如朱熹的诠释思想作个案研究，而对其他流派、哲学家的诠释思想则少有涉及。尤其把整个宋明理学的经典诠释思想作为一个整体和研究对象来加以研究，探讨其基本理论和特色的还较少。因此，以中国哲学作为文化交流的主体，从宋明理学的角度反观西方哲学诠释学，来从事二者的比较；又从西方哲学诠释学的角度来观察宋明理学经典诠释思想，这样进行双向比较，有较大的客观性和可信性。

从事宋明理学经典诠释思想的探讨研究，尝试使用中西比较法，从诠释对象、前见与理解之蔽、方法论、实践智慧、本体论、知识论等方面做一番比较研究。比较西方哲学诠释学

与宋明理学经典诠释思想之异同，这是从事宋明理学经典诠释思想研究的有意义的工作。

把宋明理学经典诠释思想与西方哲学诠释学作比较，可以发现，双方存在着相同相异之处。其相同之处体现了中西方诠释思想的共性，其相异之处又是中西方诠释思想各自特点的反映。

（一）关于宋明理学经典诠释思想与西方哲学诠释学的相同之处

1. 均重视理论创新，对语言文字的考辨不予过多的重视

西方诠释学最早是作为一种诠释技艺而出现，早期诠释学是与对《圣经》的注释联系在一起的。施莱尔马赫实现了从神学的《圣经》释义学到哲学的普遍诠释学的转折，使诠释学突破了具体诠释对象的局限性，把《圣经》注释学扩展到对所有文本的解释，使诠释学从局部诠释学到一般诠释学，成为一门关于理解和解释的一般学说，完成了诠释学的现代过渡。狄尔泰以直观与体验的方法来体验生命的真实与价值内涵，提出诠释学是精神科学的方法论基础，进一步发挥了方法论的诠释学。至20世纪20年代末，随着海德格尔的划时代著作《存在与时间》的出版，诠释学经历了一场从认识论到本体论的转向。施莱尔马赫和狄尔泰把诠释学从一般性的方法和技巧提高到普遍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高度，海德格尔则在其存在论基础上，把理解和解释作为此在的存在方式，从而建立起“此在诠释学”。伽达默尔则在海德格尔的基础上建立起哲学诠释学。由此可以看出，西方诠释学的发展是从注解到翻译到哲学的理论创新过程；是诠释者不断从自己已有的视界出发，不断地扩展自己的视界，与对象的视界进行融合，形成一个全新的视界而加以理论创造，而对于文本的语言文字不予过多的重视和考辨。与此相似，宋明理学的经典诠释思想也重在理论创新，把经典文本作为载道的工具，重在求道明义理，突破了以往汉学重训诂考释的诠释方法，把经典诠释提高到探寻本体的高度。

2. 均重视理性，重视诠释者的个体体验和领悟，而不局限于文本

与重视理论创新，对语言文字的考辨不予过多的重视相关，西方诠释学亦重视理性，重

视诠释者的个体体验和领悟，而不局限于文本和词语表达。施莱尔马赫提出并强调心理的解在理解过程中的必要性，伽达默尔则把读者对文本的解读视为一种借助于文本而实现“此在”的存在方式。诠释的结果与文本原义不可能完全吻合，这就必然存在着与作者不同的别样理解和领悟。其理解不用完全符合文本本义，理解是一个通过心灵领悟和介入，不断超越文本意义而产生新意的创造性过程。与此相近，宋明理学的经典诠释思想的经典观亦强调以己意解经，不受先儒解经旧说的束缚，而把经典文本视为阐发新思想的工具，更重视个体心灵领悟和发挥创造，实现理性主义的文化超越，以适应社会和思想发展的客观需要。

3. 均重视本体的思考，把方法论提升为本体论

伽达默尔在海德格尔的本体论变革的基础上，把西方诠释学由一般方法论的诠释学上升到本体论的高度，使诠释学实现了从作为一门理解技艺和一般方法论的学问向哲学意义的本体诠释学的创造性转变。与此相似，宋明理学的经典诠释思想由以对经典的训诂注释的方法论为主，发展到以阐发其“天理”的本体论为主，强调经典诠释的目的是为了明理，经典是载道之书，理即道存在于儒家经典之中，而不存在于注疏之中，由此重视对经书义理的阐发，创“天理论”思想体系，以新儒学的“天理”解释儒家经典，通过对以“四书”为主的儒家经典的阐释，逐步以最具时代特点、具有思辨色彩的“天理论”哲学取代汉唐诸儒缺乏哲学思辨性的训诂考据的方法论之学。文本作为诠释的对象，其本身并不本来就具有本体之意，而是靠释经者借鉴它说来创造，如程朱借用佛老本体说来阐释儒经，又把“天理论”、道统论说成是出自于圣人所作之经书。

4. 均重视实践，开拓出由生命的根源到生活的实践，或对于理解的展开运用

伽达默尔创立理解本体论诠释学，关注当下之在的存在方式，重视理解的应用性，其哲学发展具有实践哲学的走向，而其哲学诠释理论具有鲜明的实践哲学的意义。宋明理学经典诠释思想

亦具有鲜明的实践哲学的意蕴，程朱认为治经是一种实学，强调把治经得到的“天理”贯彻到社会治理的实践中去；王阳明心学的经学观亦强调以己意说经，致良知，“破心中贼”，将道德践履与社会实践相结合，开拓出由生命的根源到生活的实践。二者均体现了对实践的重视。

除以上二者有相同相似之处外，西方哲学诠释学与宋明理学经典诠释思想作为两种不同文化系统的产物，双方亦存在着不同之处。

(二) 关于宋明理学经典诠释思想与西方哲学诠释学的不同之处

1. 西方哲学诠释学有系统的理论，中国哲学和宋明理学则缺乏系统的诠释学理论，而有待于建构

西方哲学诠释学在对诠释对象、前见与理解之蔽、方法论、实践智慧、存在与意义、意义与理解、理解与诠释、理解与语言、理解与前理解，以及作者中心、文本中心、读者中心等问题的论述上有系统的诠释理论，形成了一套自己的、完整的哲学诠释学理论体系，而中国哲学、宋明理学的经典诠释思想尽管有丰富的经典诠释传统和丰富的诠释思想资料，但成体系、成系统的哲学诠释学理论尚处于建构的过程中。

2. 西方基本上不重视疏注性的诠释，宋明理学则有重视训诂考释的一派

西方诠释学较为重视批判和逻辑重构，以突破现有的概念范畴与体系为哲学思考的精神所在。所以西方基本上并不重视疏注性的诠释，因为这样往往会先行接受一个已有的体系，而与其自身诠释的宗旨和最终所要达到的目的不同。宋明理学思潮中的朱子学一派却重视训诂考据，并将疏注性的诠释直求经文之本义与阐发“天理”以求道有机地结合起来。而西方不重视疏注性的诠释的特点则与理学中陆王心学一派的经典诠释观比较接近。

3. 西方诠释学方面，伽达默尔的理解的理论并不直接包含道德与价值尺度，而宋明理学在经典诠释中则把提倡伦理作为核心价值

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对于伦理的实现不予更多的重视，在其代表著作《真理与方法》中论述了艺术、历史和语言，却未专门论述伦

理道德。也就是说，其理解的理论并不直接包含道德与价值尺度，未能就有关伦理道德与宗教现象作本体理解与诠释。这与西方伦理学拒斥本体论，导致相对主义盛行和伦理学地位的下降有关。而宋明理学在经典诠释中则把本体论与道德论结合起来而统一于“天理”或良知，以本体论为伦理学的基础，把传统伦理学建构在“天理论”的基础上，而将明理、致良知作为诠释经典的首要目的。中国哲学的普遍价值就体现在经典之道或“天理”、良知中。

4. 西方诠释学关于本体的见解与中国哲学、宋明理学关于本体的涵义存在着不同的理解

虽然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和宋明理学的经典诠释思想均重视本体的思考，把方法论提升为本体论，但宋明理学乃至中国哲学的本体观念主要是指根源和事物存在的根据，而伽达默尔的本体则主要强调整解的重要性，把“理解作为本体”，将理解的历史性上升为诠释学原则，重视理解的应用，而语言性是理解的基本特征。这与中国哲学、宋明理学所持宇宙万物产生的根源和事物存在的根据之本体义存在着差别。

5. 伽达默尔所谓的理解不以文本为依据，这与宋明理学对文本的相对重视有别

虽然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和宋明理学的经典诠释思想均重视理论创新，对语言文字的考辨不予过多的重视，由此不局限于文本的表达，其理解不用完全符合文本本义，但宋明理学尤其是朱熹一派仍对文本予以一定程度的重视，主张通过“四书”来阐发天理，并非对经典文本斥之不用。即使陆王心学一派也不完全抛弃经典，亦通过对《孟子》、《大学》的解读，来发明心学伦理和致良知理论。而伽达默尔所谓的理解则不以文本为依据，不用符合文本的本义，在与理解主体的互动中赋予文本以新的意义，是文本意义的创造与生成。这与宋明理学对文本的相对重视有别，但在重视程度上，理学内部如以上所说朱熹派与陆王派也不一致。

总之，宋明理学经典诠释思想在学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产生了深远影响。在与西方哲学诠释学的比较中，对建构当代中国诠释学，深化中国哲学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

本文作者：四川师范大学首席教授、中国
哲学与文化研究所所长
责任编辑：周勤勤

Annotation Thoughts of Neo-Confucianism Classics in Song and Ming Dynasty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Comparing with Western Hermeneutics

Cai Fanglu

Abstract: China has a tradition of annotating Confucian Classics as long as more than two thousand years, and has rich materials about hermeneutics, thus has developed some representative annotating methods and theories. However, we can hardly find some hermeneutics with rigorous logic and complete system. By drawing on the thinking achievements of the western hermeneutics, exploring the rich New-Confucian thinking materials of New-Confucian philosophers, and based on large amount of Confucian classics annotation by several schools of New-Confucian and their methodologies, This paper extracted the classical annotation thought of New-Confucianism in Song and Ming Dynasty, and made a comparison with the western hermeneutics, so as to offer some references for the contemporary hermeneutics construc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 New-Confucianism in Song and Ming Dynasty; classical annotation thought; western hermeneutics